

教育家精神赋能中国教育学自主知识生产:价值、逻辑与路径*

■赵梦雷¹,王晓燕²

摘要:深刻领会和践行教育家精神,为推进中国教育学自主知识生产提供了强大的精神动能。作为中国教育学自主知识的标识性概念,教育家精神意蕴的教育强国之音、百年自主之愿、国际影响之道,有力地奠定了中国教育学自主知识生产的基础。赋能中国教育学自主知识生产,教育家精神形成了以价值导向明确中国教育学自主知识生产的方向性、以文化传承厚植中国教育学自主知识生产的民族性、以主体建构赋予中国教育学自主知识生产的主体性、以实践转化提升中国教育学自主知识生产的适切性、以全球治理拓展中国教育学自主知识生产的世界性等多重逻辑向度。教育家精神赋能中国教育学自主知识生产,需强化精神引领,坚定知识的“方向性生产”;增强文化认同,夯实知识的“民族性生产”;树立主体自觉,深化知识的“自主性生产”;注重理实融合,促进知识的“适切性生产”;融入全球视野,推动知识的“世界性生产”。

关键词:教育家精神;中国教育学;自主知识生产;主体自觉

引用格式:赵梦雷,王晓燕.教育家精神赋能中国教育学自主知识生产:价值、逻辑与路径[J].教育理论与实践,2026(4):11-19.

中图分类号:G521 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1004-633X(2026)04-0011-09

知识是人们对世界规律的实践探索而总结形成的系统化、结构化、体系化的符号产物,是人类文明进步的载体。知识生产作为知识探索过程的核心机制,意指“人们认识、反映和再现客观世界(包括自然界、人类社会和人类自身)的过程,本质上是人类的主观精神活动”^[1]。中国教育学作为人类教育学话语的特殊形态,其知识生产旨在基于中国本土社会实践和传统文化,通过构建自主的学术范式和创新性的话语逻辑,以知识主体性致力于形成服务中国教育现代化实践的理论体系。然而,这一体系并非自发、自为的自然生长过程,而是需要明确的价值牵引、方法自觉与精神动能的持续供给。2016年5月,习近平总书记在哲学社会科学工作座谈会上提出“加快构建中国特色哲学社会科学”^[2],为中

国教育学自主知识生产确立了以中国问题为中心、以中国经验为基础、以中国话语表达为目标的根本遵循。2022年4月,习近平总书记又进一步指出,“加快构建中国特色哲学社会科学,归根结底是建构中国自主的知识体系”^[3],这从根本上揭示了中国教育学知识创新的方向与着力点。2023年9月,习近平总书记在致全国优秀教师代表的信中提出中国特有的教育家精神,即“心有大我、至诚报国的理想信念,言为士则、行为世范的道德情操,启智润心、因材施教的育人智慧,勤学笃行、求是创新的躬耕态度,乐教爱生、甘于奉献的仁爱之心,胸怀天下、以文化人的弘道追求”^[4]。教育家精神融合了中国崇文励教的历史文化,融汇了民族精神与时代气质,成为推动中国教育学发展的独特

* 本文系中国博士后科学基金第18批特别资助项目“中国数字教育学知识生产的话语机制与建构路径研究”(项目编号:2025T180459)的阶段性研究成果。

作者简介:1.赵梦雷(1989-),男,安徽利辛人,淮北师范大学教育学院副教授、教育学博士、硕士研究生导师,中国教育科学研究院教育理论研究所博士后,主要从事教育基本理论研究;2.王晓燕(1980-),女,甘肃白银人,中国教育科学研究院教育理论研究所副研究员,新时代教育思想研究中心副主任、教育学博士,主要从事教育基本理论研究。通讯作者:王晓燕。

精神标识。构建中国教育学需以此独特的精神力量统摄教育学自主知识生产,在国家战略导向与学术问题探索的耦合中持续释放创新动能。教育家精神作为其内生驱动力,能够为中国教育学自主知识生产提供持久支撑,有力地将教育经验、地方性知识与教育改革探索转化为可解释、可推广、可检验的教育理论成果,形成系统化的学术表达,推动中国教育学由“跟随式依附”迈向“主体性创生”。这不仅关涉教育理论的自立,更意味着以中国经验解释中国道路、以中国理论参与全球对话、以中国方案贡献人类文明新形态。

一、弘扬教育家精神是推动中国教育学自主知识生产的前提基础

作为教育的精神信仰,教育家精神成为教育探索的伦理核心,其凝聚的理想信念、精神品格、智慧力量,能跨越时空的界域,深嵌中国特有的文化场域,成为中国教育学自主知识生产的文化基因与认知底座,为中国教育学自主知识体系建构提供了精神指引。作为一种知识生产的复合体,弘扬教育家精神推动了中国教育学超越传统的学术框架与知识范式,深刻揭示了其自主知识生产的使命要求、现实诉求与世界需求。

(一)教育强国之音:中国教育学自主知识生产的使命要求

党的二十大报告擘画了2035年建成教育强国的宏伟蓝图。习近平总书记曾在2023年5月主持中共中央政治局第五次集体学习时强调,“建设教育强国,是全面建成社会主义现代化强国的战略先导,是实现高水平科技自立自强的重要教育支撑,是促进全体人民共同富裕的有效途径,实现中国式现代化全面推进中华民族伟大复兴的基础工程”^[5]。在2024年9月召开的全国教育大会上,习近平总书记再次科学回答了“什么是教育强国、为什么建设教育强国、建设什么样的教育强国、怎样建设教育强国”等根本问题。在此基础上,2025年1月,中共中央、国务院印发《教育强国建设规划纲要(2024-2035年)》,提出了教育强国建设的具体路径与实施步骤,要求“聚焦中国式现代化建设重大理论和实践问题,以党的创新理论引领哲学社会科学知识创新、理论创新、方法创新,构建以各学科标识性概念、原创性理论为主干的自主知识体系”^[6]。这既是对推进教育强国建设的理论阐释,也是对引领中国教育学自主知识体系建构的创造性回答,中国教育学自主知识生产在新的历史条件下被赋予了前所未有

的时代使命^[7]。

人无精神不立,国无精神不强。教育家精神并非孤立于个体的知识探索,而是深嵌于国家命运与民族复兴的结构性力量中。作为知识与精神的双重传递,教育家精神以“心有大我、至诚报国”的强大凝聚力和感召力,将个体知识生产从其闲逸的个人兴趣上升为服务国家的历史使命,促使其在学术探索中思考“为谁”“为何”“如何”生产知识。从孔子“仁者爱国”的君子之学,到张载提出“为天地立心,为生民立命,为往圣继绝学,为万世开太平”的修身关学;从林则徐“苟利国家生死以,岂因祸福避趋之”的慷慨悲歌,到陶行知“捧着一颗心来,不带走半根草去”的行为信条,都深刻阐明了个体与国家命运、民族复兴的高度共鸣。“知识分子不仅生产知识,而且也应用其知识来影响中国社会的发展。正因为如此,知识包含责任,生产知识的知识分子应当承担起知识的责任。”^[8]教育家精神唤醒个体以国家命运、社会责任为基准的自觉行动,强调其知识生产的理想信念和价值内核,引导中国教育学人对其知识生产的目的和价值进行重新审视,不仅实现“知识生产者的身份转变”,还以其“知识生产的路径转变”,把个人的学术追求与国家使命深度融合,融入自我的身心世界,推动其突破狭隘的学术疆界,勇敢地承担起时代的责任与使命。中国教育学人以教育家精神强大的信仰寄托,激励其主动作为,明晰中国教育学自主知识生产的使命感和责任感,将其知识生产紧密嵌入国家命运、服务强国建设。

(二)百年自主之愿:中国教育学自主知识生产的现实诉求

百余年来,中国教育学知识生产一度依附西方的学术标准、理论框架、研究范式和话语逻辑,其学术自主性式微,无法有效回应中国教育的独特需求。“中国教育学从它发生之日起,就一直处于一种身份焦虑状态之中。”^[9]“中国知识分子将‘西方中心主义’的理念进一步内化,其核心叙事是‘中劣一西优’,不但以西方价值作为认识中国历史和现实的最高标准,更要以西方价值作为改造当代中国的标准。”^[10]西方话语在全球的主导地位架起了中国教育学的话语枷锁,使其面临知识裂隙与自我定义缺失的困境,不得不在不平等的知识结构交换中尝试自我定位。习近平总书记曾指出,“我们的哲学社会科学有没有中国特色,归根到底要看有没有主体性、原创性。跟在别人后面亦步亦趋,

不仅难以形成中国特色哲学社会科学,而且解决不了我国的实际问题”^[2]。这意味着发展中国教育学的自主性成为了其知识创新的根本要求。若缺乏自主知识生产能力,就无法为中国教育现代化建设提供有效的理论支撑,其在全球知识语境中就会处于边缘化状态。

百年教育学自主知识生产的愿望不仅是对中国教育现实深刻反省,亦是对其未来之路的理性构思。教育家精神以“言为士则”“求是创新”的自主性思想,赋能中国教育学自我更新和他者超越的学术自觉,促使中国教育学从“知识追随者”转向“知识建构者”,以自主知识生产力突破“他者”的话语规训。可以说,教育家精神展现的是个体对历史责任感与社会使命感的深度唤醒。从舒新城倡导“中国的教育中国化”,到刘佛年探索“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教育理论”之路,再到叶澜系统构建中国“生命·实践”教育学派等,他们以非凡的学术勇气和文化自觉,努力挑战并超越西方主导的学术标准、价值意涵、研究范式、话语逻辑。中国教育学自主知识生产正是在教育家精神的引领下,以其深层的文化自信与历史责任感,使其从历史的被动依附逐步走向自主创新的新征程。中国教育学人以自主创新的学术精神,推动中国教育学知识生产的自主性,使其在学术立场、问题视角、研究范式、话语逻辑等知识生产方面确定教育学自主知识的理论内涵,提出具有中国特色的教育解决方案。

(三) 国际影响之道: 中国教育学自主知识生产的世界需求

全球化使各国非正式教育组织、高等教育机构、企业市场、政府合作等结构形成了有机互动,推动了世界知识“爆炸式增长”。人类知识的交流与互动不再局限于物质资源的区域流动,而是通过文化交流、学术价值、思维方式、行为趋向的多元融合,共同推动其知识的生产、传播与更新。教育作为提升国家文化认同和软实力的重要载体,其知识生产已不限于国家的内部功能,而且在国际秩序、全球政策、国际合作、文化交流等方面的表现愈发重要。习近平总书记曾指出,“要根据国际形势发展变化,完善教育对外开放战略政策,统筹做好‘引进来’和‘走出去’两篇大文章,有效利用世界一流教育资源和创新要素,使我国成为具有强大影响力的世界重要教育中心”^[2]。因此,中国教育学必须回应全人类面临的共同挑战。无论在全球教育公平、可持续发展,还是跨文化交流、知识共享等方面,中国教育

学在国际上都扮演着重要的角色。“这样一种社会结构势必要求知识分子一方面参与社会角色的分工,专门从事文化价值符号的构造以及技术应用,富有知识的专业精神;另一方面则立足专业的基础上,怀有严肃的社会使命感,关怀全民族和全人类的共同命运。”^[11]

教育家以“胸怀天下、以文化人”的弘道追求及“兼济天下、赓续文明”的弘道宏愿,彰显了学者知识生产的世界情怀。如林则徐高呼“睁眼看世界”,不仅是为中国开辟外交大门,也是对知识全球化和文化交流的深刻洞察;容闳实施“幼童留美计划”,则是中国教育全球化过程中不可忽视的重要一步,为中西文化交融提供了典范;蔡元培“胸怀世界,造福全人类”的宏大理想,更是教育家精神的高度体现,强调通过教育的全球影响力为人类共同命运开创未来。这些教育家精神的崇高理想推动了中国教育学自主知识生产的国际化,为提升中国教育学世界影响奠定了坚实的思想根基。其不仅是中国教育学自我“突围”的过程,而且通过“输出”中国的教育改革成就塑造国际影响的中国话语,为全球教育理论知识体系贡献力量,推动全球公共事业迈向更加包容、普惠和共生的未来。

二、教育家精神赋能中国教育学自主知识生产的逻辑向度

教育家精神是马克思主义理论与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教育发展深度融合的体现,展现了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教育学对马克思主义教育学的继承和发展,是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的最新成果。其蕴含着教育家“小我—大我—无我”的生命意识、“悟道—传道—弘道”的教育情怀、“生存—生活—生生”的实践智慧^[12],熔铸了中国教育学自主知识生产“为国家”“为人民”“为时代”“为世界”的精神觉醒与价值旨归。作为推动中国教育学自主知识生产的内在动力,教育家精神以其独特的价值引领、文化传承、主体建构、实践转化和全球治理等“五位一体”的逻辑向度,有力赋能了中国教育学自主知识生产。

(一) 价值导向: 明确中国教育学自主知识生产的方向性

教育家精神以国家诉求与社会责任的塑造,超越传统的知识传授,体现了教育的“道德性”和“历史性”。正如柏拉图视域下的教育是为理想国民而服务,通过“知识的启蒙”使个体内心的德性得到培养,引导个体达到“真善美”的理想境界,培养教育者的道德判断力

和责任感。这种理想精神并非抽象的空想,而是扎根于具体的社会历史背景,通过教育推动社会的进步。作为中国教育学自主知识生产的内在动力,教育家精神的“心有大我、至诚报国”的理想信念,深刻诠释着教育家服务国家、服务人民、服务中华民族复兴的伟大理想。其所内涉的“为谁培养人”“培养什么样的人”“怎样培养人”这一根本性教育问题,就是“坚持走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教育发展道路,这就决定了我们培养的人一定要拥护中国共产党的领导,立志成为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事业的建设者和接班人”^[13]。

教育家精神把中国教育学自主知识生产的导向与国家命运紧密相连,形成了一个非线性而充满动态生成的“知识流”,“实现其在个人发展、教育领域以及社会层面的广泛渗透与深远影响”^[14]。如张之洞、严复、康有为、陶行知、陈独秀等,他们通过教育宣传新思想、实施新方法、探索新模式、开展新实践等举措,兴新民、开民智、培养人才、革新政治,为民族复兴注入了强大动力。康有为创办的“万木草堂”,聚天下英才而教之,致力于探寻“广罗英才、穷理创义、破旧立新”的教育改革路径,成为民族复兴的重要推动者。在中国式现代化背景下,教育家精神为中国教育学提供了一个清晰的探索框架,其自主知识生产在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的指导下,紧密围绕中国式现代化的战略目标,明确教育学知识生产是服务于党和人民的事业,旨在培养具有社会责任感、历史使命感、家国情怀的新时代公民。

从微观视角看,教育家精神以“启智润心”“因材施教”“乐教爱生”的育人理念,注重个体体验与文化情感,强调对个体差异的尊重,凸显了中国教育学知识生产的人本知识观。这种知识导向推动中国教育学从“静态知识规范”向“动态知识生成”转变,其不仅注重宏大的社会理想,而且更加关注人的个性化需求。“通过关注共同在场情境下的互动如何在结构上融入具体广泛时空延申的系统,即关注共同在场情境下的互动系统如何在大规模的时空范围中伸展开来,考察所谓‘微观’与‘宏观’之间的关系问题。”^[15]通过探索人的多样性需求,将教育学知识从技术与工具理性扩展到价值理性与人本关怀,能够确保其知识生产紧密关注人的个性需要,并在尊重学生个性与发展差异的基础上,构建符合中国社会、文化背景和历史传统的知识生产方式。

(二) 文化传承:厚植中国教育学自主知识生产的民族性

习近平总书记强调:“如果没有中华五千年文明,哪里有什么中国特色?如果不是中国特色,哪有我们今天这么成功的中国特色社会主义道路?”^[16]文化是民族之魂,没有文化,民族就失去了灵魂。中华文化作为中国五千多年文明积淀的结晶,深刻影响了中国教育学自主知识生产。“要创建中国特色教育学,须追溯中华优秀传统文化的源头,那是我们教育文化的根系所在。”^[17]作为中国教育学自主知识生产的历史渊源,中华优秀传统文化承载着丰富的民族思想资源,如《论语》《孟子》《荀子》《礼记》《学记》《大学》《传习录》等优秀传统文化都是构建中国教育学的核心力量。“中华优秀传统文化为构建中国教育学提供了具有标识性的价值引领,其中蕴含的天人合一、道法自然、家国一体、革故鼎新、自强不息、和而不同、亲仁善邻等观念,是形塑中国教育学的深层文化‘基因’。”^[18]这些文化思想影响了中国教育学的教育目的、方法、原则、模式,成为推动其自主知识生产的文化基础。

“教育家精神是教育文化的主体化、信念化,是对教育文化的集中概括,也是中华优秀传统文化和民族精神的教育表达。”^[19]教育家精神强调的“至诚报国”“乐教爱生”“行为示范”“胸怀天下”等要求,直接承接了中华优秀传统文化的精髓,潜移默化地厚植了中国教育学自主知识生产的民族性。如教育家精神将《礼记·大学》中“修身齐家治国平天下”,《礼记·文王世子》中“师也者,教之以事而喻诸德者也”,《论语·泰伯章》中“士不可以不弘毅,任重而道远”,《礼记·礼运》中“大道之行也,天下为公”,《论语·卫灵公》中“人能弘道,非道弘人”等中华优秀传统文化,创造性地转化为了新时代教育实践中的“课程思政”“立德树人”“办好人民满意的教育”等具体内容。这种民族精神的传承、转化、创新,使得中国教育学自主知识生产厚植于中国深厚的文化土壤,达到了对传统教育理念的现代性超越。

可见,教育家精神将中国教育学的文化内涵与时代使命结合起来,实现对传统文化知识的继承和发扬,在中国教育学知识探索中形成了中国传统教育思想的文化自觉,使其“植根于中国教育的深处,构成了当代中国高质量教育的文化底色和文化形象,成为高质量教育的‘中国底色’”^[20],为赋能中国教育学自主知识生产筑牢“民族魂”。

(三) 主体建构:赋予中国教育学自主知识生产的自觉性

构建中国教育学自主知识体系,需强调中国教育学的主体性,但并非自说自话、自我封闭,忽视或抵制西化理论。中国教育学不仅要吸收西方理论的精华,还要避免盲目模仿和过度依赖。习近平总书记指出:“对人类创造的有益的理论观点和学术成果,我们应该吸收借鉴,但不能把一种理论观点和学术成果当成‘唯一准则’,不能企图用一种模式来改造整个世界,否则就容易滑入机械论的泥坑。”^[2]

教育家精神以“勤学笃行、求是创新”的躬耕态度,强调了对知识的批判性吸收和创造性建构,赋予中国教育学一种深刻的主体自觉性。这种自觉性并不止于对西方教育学知识的吸收与再现,还表现为以主体的自我认识和自我反思,“赋能教育学知识生产的本质、意涵、方法、范畴、概念等所关涉的理论体系要素”^[7],从而实现“他者”话语的超越。“真正的教育总是要靠那些不断自我教育以不断超越的教育家才能实现。他们在与人的交往中不停付出、倾听,严格遵守理想和唤醒他人的信念,以学习的方法和传授丰富内容的方式找到一条不为别人所钳制的路径。”^[21]中国教育学自主知识生产,不是简单的西方教育理论的“翻版”,而是以“中国标准、方法、视角”的主体自信,提出具有“中国性”的教育理论。

教育家精神的主体建构,鼓励教育学者独立思考、敢于突破传统的知识框架,勇于开拓新视野、探索新领域、提出新观点、形成新范式,为中国教育学自主知识生产开辟新境界。在古代中国,有孔子的“有教无类”、墨子的“兼爱非攻”、王阳明的“心外无物”及王安石的“崇实尚用”等教育思想,他们“发前人之未发,谋他人之未谋”,提出了中国自主的教育理论。在近代中国,蔡元培、陶行知、晏阳初、梁漱溟、陈鹤琴等创办新教育,开创了中国教育理论自主创新的新局面。新时代,“以人民教育家为代表的一批批教师群体,以赤诚之心、奉献之心、仁爱之心积极投身教书育人和科研创新之中”^[22],形成了教育学自主知识生产“潜在成就梯度”^[23]的发生场。这一切都是教育家精神驱动下的主体自觉——它赋予了教育研究者创新思维和敢于突破的勇气,激发了他们对教育问题的敏锐感知和对解决方案的执着追求。教育研究者自觉的主体建构为推动中国教育学自主知识生产奠定了坚实的基础。

(四) 实践转化:提升中国教育学自主知识生产的适切性

实践转化是中国教育学自主知识生产的重要环节,展现了教育理论与实践之间的深度融合。中国教育理论不能停留在抽象的知识思辨上,更应体现在如何被有效地应用于教育实践,服务于中国式教育现代化改革需求。因此,实践转化的适切性意味着理论知识与社会现实、教育需求之间紧密结合,这既能帮助现实问题得以有效解决,也能推动教育理论创新性发展。从知识生产的创生角度而言,教育家精神为实践知识转化提供了重要的“认知框架”。教育家精神以“笃行”与“求是”的核心理念,倡导教育理论知识向实践转化。实践知识的转化需基于发现问题、分析问题和探索解决问题的路径,将理论与实践紧密联系。教育家精神强调理论知识在“知行”中检验并转化为适切的实践方法。只有在实践中反复验证,才能找到隐藏于复杂情境中的“多域联结”^[24],理论才能真正发挥作用。作为教育实践的开创者、革新者,教育家需要深入剖析社会文化、历史背景、教育需求等多重因素,努力发现被忽视的、潜在的教育机理,探索其背后的深层逻辑。

同时,以实践取向的教育学者有力地突破了传统“书斋式”的知识生产惯习。“书斋式”的理论探讨脱离了现实需求,使实际知识抽象、晦涩难解,难以落地应用,加剧了理论与实践之间的割裂。而教育实践者利用知识的实践化创新,将其转化为社会适应性的知识产品,为理论完善提供了更为灵活、具有实践导向的知识生产范式。纵观人类教育史上具有世界影响力的教育思想家,他们的教育理论无不以实践探索为基础。如福禄培尔创办“德国普通教养院”,奠定了幼儿教育的理论基础;杜威的“芝加哥实验学校”,构建了以经验为中心的现代教育理论;洪堡通过创立“洪堡大学”,开创了现代大学的教育新模式;陶行知通过创办“晓庄师范学校”,丰富了生活教育思想。“所有这些都至少牵涉到行动者有目的和运用理性的行动,以及这种行为与行动者所处社会情境及物质情境的制约性和使动性特征之间的相互关联。”^[15]这是教育家精神在实践层面的体现,也是中国教育学自主知识生产需要深入教育实践探索新范式的过程。

(五) 全球治理:拓展中国教育学自主知识生产的世界性

全球治理是面向人类共同福祉的跨国共治,关乎

全人类的共同利益。作为推动人类共同事业发展的核心力量,教育成为加强不同区域联结的重要基石。联合国教科文组织提出,“必须将知识共享定义为全人类的共同遗产”^[25]。这不仅为全球治理提供了知识供给,也为教育领域的共同目标设定了共同的价值导向:呼吁各国基于教育巩固公共事业和共同利益,推动其构建一个面向全人类的社会新契约。

教育家精神以“胸怀天下”“以文化人”的远见追求,展现了教育学者服务全人类福祉的责任情怀。正是他们这种致力于人类解放、人的自由全面发展而服务的精神,彰显了中国教育学的人类共同价值属性,使其自主知识生产从“单向输入”转向“双向互构”。其中,教育家精神所具备的“仁爱、务实、创新”特质,使得中国教育学知识生产不止于理论的言说,而是付诸于实际行动。无论是人类教育公平、文化多样性、社会正义,还是和平发展、环境污染、医疗卫生等全球性挑战,中国教育学者基于《推动共建“一带一路”教育行动》,积极参与全球教育共同体的建设,大力弘扬全人类教育价值,在不同文化之间构建知识互联互通的伙伴网络,加强资源共享与知识融合,推动了人类命运共同体的构建。因此,教育家精神赋予中国教育学独特的伦理支撑和创新驱动力。这使其知识生产着眼于人类文明的永续发展,超越狭隘的民族视野,树立整体知识共享观,以“天下为公”的世界胸怀,回应全球教育的共同挑战,推动中国教育学自主知识生产不断向外拓展,积极在世界教育学知识体系中展示中国智慧,成为全球教育创新和人类文明进步的重要力量,为构建更加包容和共生的全球公共教育秩序贡献中国方案。

三、教育家精神赋能中国教育学自主知识生产的实践路径

教育家精神为赋能中国教育学自主知识生产提供了清晰的逻辑理路。弘扬教育家精神需要我们自我审视“有没有形成自己对教育的独特见解和一套能付诸实践的教育理论,并通过实践的行动形成教育界公认的创新性教育成果,并对当代乃至后世的教育思想和实践产生重要的影响”^[26]。以教育家精神赋能中国教育学自主知识生产,能够在精神引领、文化认同、主体自觉、理实融合、国际视野等方面形成一个有机的知识生产机制,为中国教育学自主知识生产提供深厚的理论支撑。

(一)强化精神引领,坚定知识的“方向性生产”

作为一种全方位、跨维度的伦理责任,教育家精神贯穿于中国教育学自主知识生产的内涵、目标之中,深刻嵌入了知识“方向性生产”的底层逻辑。其内在质的规定性规约着教育学知识生产“学术何为”“知识为谁服务”的过程,关涉着教育者和被教育者之间深层的价值对话与互动的伦理功能,不仅要求教育学关注知识生产的“存粹”技术性,更需关注通过知识的深度建构来培养人的精神信仰与社会价值。因此,教育家精神之于中国教育学自主知识生产的要义,在于立足精神自立,依托“以省促自立、以行促自成”^[27],塑造教育者的思想认同、社会责任与政治品格,从而确立知识生产的目的与知识生产的价值。

为此,必须强化教育家精神引领,从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出发,肩负“为党育人、为国育才”的教育使命,形成深厚的社会责任感与家国情怀,践行并筑牢教育家精神。这一责任的内化为中国教育学自主知识生产提供了坚定的方向性引导,明确了其知识生产在当代中国话语体系中的定位,使教育学者在研究中能够自觉地以高度的社会责任感、理想信念、道德情操、社会责任感和创新精神开展知识生产,进一步推动了学术成果的社会价值。在这一过程中,需要通过定期专题学习和教育家精神研讨活动,深化对其价值内涵的理解,促使教育研究者反思自己的学术目标与社会责任,强化“铸魂育人”的价值理性,从而始终保持对国家和社会需求的高度敏感性,将个体的知识生产与国家发展的战略目标及社会进步紧密结合,使其学术研究在服务社会、培养人才、推动国家发展的过程中,发掘个体知识生产的内在社会价值和现实意义。

(二)增强文化认同,夯实知识的“民族性生产”

独特的文化传统、独特的中国特色社会主义道路,注定只有具备强大的文化认同,才能为中国教育学自主知识生产提供精神支撑。文化认同以高度的文化自信力赋予中国教育学知识生产以内在驱动力。教育家精神对文化自觉和历史使命的深刻理解,是对“地方性知识”的深度再造与本土化重构,夯实了中国教育学知识的“民族性生产”。教育家精神作为学术探讨的文化立场,其“知识特殊性”推动了教育学者对“中国经验、中国眼光”的文化性进行“结构性”的知识生产。中国教育学自主知识生产“能以本民族文化的承接为基础,与‘世界文化’发生对接,从而最大限度地激活已有的文

化资源,在整合的意义上生成具有广度与厚度的新的教育知识”^[28]。

因此,夯实中国教育学自主知识生产的民族性力量,必须增强对中国教育家精神文化的认同,明确中国教育学自身的历史坐标和社会空间。其至少关涉三个方面:一是加强传统教育价值观的传承。通过对中国教育家精神文化教育理念的传承与创新,能够促使教育学者反思和重构“仁爱教育”“德行育人”等传统教育理念,为其赋予新的时代内涵,并将其融入现代教育实践,从而形成认同与尊重教育家文化的价值观念。二是推动教育理论的本土化创新。在以教育家精神推动教育理论创新时,必须注重将传统文化中的教育理念和方法与当代中国社会的发展需求相结合。中国原创性的教育学知识话语需融入中国的社会背景、历史传统和现代社会教育的多元需求,提炼出适合本土的教育理论。三是明确教育学知识生产的历史使命。作为增强文化认同的核心力量,教育家精神使中国教育学知识生产具有深刻的历史使命感。中国教育学者需深刻理解中国教育文化根基,通过学术创作和理论建构赋予中国教育学知识生产文化动力,在现代化教育语境中维持传统文化的连续性,以解构西化“惯性意识”的规训思维,超越外部理论框架,形成中国自主的知识体系。

(三) 树立主体自觉,深化知识的“自主性生产”

长期以来,教育研究者过度依赖和模仿西方的知识生产范式和理论构架,而教育家精神所倡导的批判性和反思性“思维品格”,激发了教育研究者的独立思考与自主创新能力,推动中国教育学“力图主动摆脱外部依赖,主动走出依赖异域的理论和知识输入的发展惯性”^[29]。

一方面,作为学术研究的主体,中国教育研究者需具有独立思考 and 理论创新的自觉性。其要敢于挑战突破西方教育理论的窠臼,在中国的历史、文化、社会等场域中,以“中国性”的范畴演绎,超越域外的学术框架和理论模式,为中国教育学提供原创性的学术话语和理论架构。这不仅需要学者对中国教育问题进行深度洞察和全面分析,更要树立主体自觉,弘扬求真至善、务实创新的学术精神。求真至善、务实创新是学术知识生产的“场域符号”,直接影响着学术研究的成效。历史上具有颠覆性的教育思想大多源自对教育本质的长期探究。如洛克坚持对传统教育的批判,提出了“经验主

义”教育理念;杜威在长期反思赫尔巴特教育理论的基础上,创立了新的教育思想。中国教育学者需以“仰之弥高,钻之弥坚”的学术追求为导向,秉持严谨治学、务实创新的态度,自觉抵制浮躁学术风气,潜心研究教育规律与实践。“中国教育学自主知识体系的建构,必以中国教育学学者的精神自立为第一条件,而决定他们精神自立的最基本最主要的要素,当是求真至善和务实创新的学术精神的具备。”^[30]

另一方面,从知识生产主体的跨学科而言,中国教育学研究日益呈现出跨学科知识融合的特征。迈克尔·吉本斯等人在考察不同社会科学知识生产模式的基础上,提出知识生产模式1是以学科和大学为知识生产主导,而知识生产模式2是在更广阔的跨学科社会应用情境中被创造出来的。“在模式2中,最终解决办法的形成通常会超越任何单一的学科。它将是跨学科性的。”^[24]且随着社会形态的变革,模式2会逐渐补充模式1并占据知识生产的首要位置。教育问题具有高度复杂性,需要教育研究者主动破除学科界限,以跨学科合作的意识,在社会学、统计学、人类学等多学科的交汇处进行知识的创造,结合社会学的结构分析、统计学的数理处理以及人类学的深度解读等多域知识,厘清逻辑思路、明晰科学内涵、拓展学科范畴,构建深层次、弥散式、复合型的教育学知识体系。

(四) 注重理实融合,促进知识的“適切性生产”

理论与实践的融合是中国教育学自主知识生产的核心路径,也是实现其知识不断更新和创新的必要条件。在教育家精神的引领下,通过“笃行”的实践导向,中国教育学能够在理论与实践知识的交互中形成“適切性生产”机制,促进中国教育学知识体系不断完善。教育家精神推动教育学者积极投身教育实践,从教育的具体情境中汲取灵感,置身教育学知识生产场域中开展“综合判断式”研究。其要求教育学者始终保持对教育实践问题意识的敏感性,促使他们深入观察与反思教育实践的问题,进而通过抽象的思维构建理论框架,统摄感性经验的知识范畴,对教育实践中的具体问题进行理论探索,并在实践中验证理论的有效性,构建逻辑自洽的“知识范畴网络”。

一方面,教育研究者要深入实践情境应用理论知识。教育学者不能仅停留在抽象的理论层面,而要基于大量的实地实验、案例研究、行动研究和实践叙事等,直接参与到教育情境中,对教育实践知识进行深度提

炼和理论升华。例如,教育学者可以通过教学改革、课程试点等组织教育改革实验项目,直接将理论知识应用于实践场域,探索复杂教育现象的多维解释,从而提升教育理论知识的适切性。

另一方面,教育研究者要在教育理论与实践知识之间形成动态的反馈与评估机制。这意味着,教育学者需把理论知识与实践应用置于同一场域进行动态观察和验证。任何一个知识循环迭代的过程,都需在每一轮理论生成与实践操作后,通过评估和反馈来优化和调整知识体系。教育研究者通过实时数据收集和分析,对理论的实施效果进行评估,并基于评估发现新问题,进而持续调整理论框架。这种动态的循环机制使得原本“静态”的理论知识探索具有了“共相”的经验连续性活动,能够实时回应教育实践中的新需求。

(五) 融入国际视野,推动知识的“世界性生产”

全球视野是推动中国教育自主知识生产的重要维度,也是中国教育对世界教育学贡献的现实体现。教育家以“土以弘道”“文明互鉴”的全球视野,以爱满天下的人类情怀,为推动中国教育走向世界提供了实践路径。通过积极融入全球视野,中国教育自主知识生产扩展了本土化知识,“以世界眼光把握中国发展和人类进步,把握历史发展规律和前进方向,以教育凝聚力量,共建美好世界”^[12],构建更加开放包容、内涵丰富的全球知识生产范式。

教育家的世界情怀不是单一地向外输出“中国经验”,而是立足中国实际,基于全人类教育的共同问题,表达中国文明的“世界性尺度”。我们要增强跨文化理解与融合,主动融入国际化课程和跨文化交流项目,积极学习和借鉴其他国家的优秀教育理论与实践经验,使其知识生产可以与世界一流学术机构和世界教育组织合作开展联合研究项目,共同探索全球教育的公共问题。围绕“教育公平”“城乡教育均衡”“教育减贫”“包容性教育”和“可持续发展教育”等具有人类普遍关切的核心议题,教育研究者可将我国教育的成功经验与全球教育发展、全人类的福祉紧密联系,通过开展国际合作研究项目、开设国际教育论坛和实施联合国教科文组织的项目合作,共建具有全球适应性的教育理论(如区域教育共同体理论、数字化教育治理理论等),为全球教育学理论提供新视角,为解决世界公共教育问题提供新的理论依据。

在“一带一路”倡议框架下,教育家精神意蕴的“世

界目的”的伟大想象,不仅是教育资源的外部支持,更应注重文化、理念和教育体系的交流与互补;不仅要主动参与国际教育援助的实际行动,加大对非洲、东南亚等地区的物资支持,派出教育专家、教师志愿者和教育帮扶团队,还要从技术经验交流深化到民情、民意、民心之间的大融合,形成多方共赢的教育交往机制。通过寻求人类公共价值观的“最大公约数”,世界各国以“熟悉感与亲密感频繁地交往,有了熟悉感与亲密感才会形成亲密的关系,并且在亲密的关系中生发诸如感知和感悟,它们共同构成知识的源泉”^[28]。如此,中国教育学在世界与人类“自证”与“他证”的交互联结中,其自主知识生产隽永着人类文明的共同价值基因,“这样的现代教育学不仅是为我的教育学,更是以我为基、以我为坐标的为世界、为人类的教育学”^[31]。

参考文献:

- [1]王骥.大学知识生产方式研究[M].北京: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2014:58.
- [2]习近平.论教育[M].北京:中央文献出版社,2024:116.120.232.119.
- [3]坚持党的领导传承红色基因扎根中国大地 走出一条建设中国特色世界一流大学新路[N].人民日报,2022-04-26(1).
- [4]习近平.习近平致全国优秀教师代表的信[N].人民日报,2023-09-10(1).
- [5]加快建设教育强国 为中华民族伟大复兴提供有力支撑[N].人民日报,2023-05-30(1).
- [6]中共中央、国务院印发《教育强国建设规划纲要(2024—2035年)》[N].人民日报,2025-01-20(6).
- [7]赵梦雷,姜朝晖.面向中国式现代化的教育学自主知识体系建构[J].国家教育行政学院学报,2024(4):40-47.
- [8]郑永年.中国的知识重建[M].北京:东方出版社,2018:230.
- [9]侯怀银.20世纪中国教育学史[M].北京:人民教育出版社,2020:38.
- [10]曹锦清.如何研究中国[M].上海:上海人民出版社,2010:69.
- [11]许纪霖.大时代中的知识人[M].北京:中华书局,2012:47.
- [12]靳玉乐,王潇晨.论教育家精神的培养[J].教育研究,2024(8):24-33.
- [13]杨兆强.新时代大力弘扬教育家精神的三维审视[J].中国大学教学,2024(8):36-44.
- [14]邹方方,周元宽,杨春萌.学科·学术·学人:弘扬教育家精神的教育学进路[J].教育理论与实践,2025,45(25):3-11.
- [15]安东尼·吉登斯.社会的构成:结构化理论大纲[M].李康,李猛,译.北京:生活·读书·新知三联书店,1998:46.282.
- [16]回答时代课题 照亮复兴征程[N].人民日报,2022-07-25

- (6).
- [17]于漪.梦想与成真[J].教育研究,2023(7):4-9.
- [18]李永智,马陆亭,姜朝晖,等.中国教育学论纲[J].教育研究,2023(4):4-11.
- [19]陈煌,杨兆山.教育家精神的文化逻辑[J].中国教育学刊,2024(8):48-53.
- [20]李政涛,王晓晓.高质量教育体系建设的中国特色与中国贡献[J].国家教育行政学院学报,2022(7):27-32,39.
- [21]雅斯贝尔斯.教育是什么[M].邹进,译.北京:生活·读书·新知三联书店出版社,1991:24.
- [22]冯建军.“教育家精神”:中国特色教育学话语体系的标识性概念[J].湖南师范大学教育科学学报,2024(2):1-5.
- [23]迈克尔·波兰尼.个人知识:朝向后批判哲学[M].徐陶,许泽民,译.上海:上海人民出版社,2021:399.
- [24]迈克尔·吉本斯,卡米耶·利摩日,黑尔佳·诺沃提尼,等.知识生产的新模式:当代社会科学与研究的动力学[M].陈洪捷,沈文钦,秦琳,等译.北京:北京大学出版社,2011:30.5.
- [25]联合国教科文组织.一起重新构想我们的未来:为教育打造新的社会契约[M].北京:教育科学出版社,2022:66.
- [26]王晓燕.走向教育家:教师的使命和追求[M].长春:吉林大学出版社,2011:98.
- [27]罗英.试论教师即社会行动者——基于人性教育学立场[J].教育理论与实践,2025,45(28):57-64.
- [28]李政涛.教育科学的世界[M].上海:华东师范大学出版社,2010:304.306.
- [29]李政涛,徐晓晓.从“基础教育”到“基础教育学”:建构中国自主基础教育学知识体系[J].华东师范大学学报(教育科学版),2024(11):146-153.
- [30]刘庆昌.中国教育学自主建构的广义认识论条件[J].西北师大学报(社会科学版),2024(1):86-97.
- [31]刘远杰.以中国为方法的现代教育学——面向中国式教育现代化的理论建构[J].南京社会科学,2023(4):146-155.

作者单位:赵梦雷 淮北师范大学教育学院,安徽淮北 邮编 235000; 王晓燕 中国教育科学研究院教育理论研究所,北京 邮编 100088

The Educator's Ethos Empowering Autonomous Knowledge Production in Chinese Pedagogy: Values, Logic, and Pathways

ZHAO Meng-lei¹, WANG Xiao-yan²

(1. School of Education, Huaibei Normal University;

2. Institute of Educational Theory, National Institute of Education Sciences)

Abstract: A profound understanding and active practice of the spirit of educators provides a powerful driving force for advancing the autonomous knowledge production of Chinese pedagogy. As a symbolic concept of China's indigenous educational knowledge, the spirit of educators embodies the voice of building a strong educational nation, the aspiration for a century-long pursuit of autonomy, and the pathway toward international influence, thus laying a solid foundation for the development of autonomous knowledge in Chinese pedagogy. By empowering such knowledge production, the spirit of educators contributes to multiple dimensions of logic: it provides value orientation that inspires innovation; it fosters cultural inheritance that deepens national identity; it supports subjectivity construction that reinforces agency; it encourages practice-oriented transformation that enhances contextual relevance; and it promotes global governance that broadens international engagement. Based on these dimensions, to truly empower the autonomous knowledge production of Chinese pedagogy with the spirit of educators, it is essential to strengthen the spiritual guidance to ensure the “directionality” of knowledge production, to enhance the cultural identity to solidify its “national character”, to cultivate the subjective consciousness to deepen its “autonomy”, to emphasize the integration of theory and practice to improve its “contextual relevance”, and to embrace a global perspective to advance its “international significance.”

Key words: spirit of educators; Chinese pedagogy; autonomous knowledge production; subjective consciousness